

# 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

张化苏采青 主编  
郑谦王寅城 副主编

# 回首 文革

第四卷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回首 『文革』

## 第四卷

张化 苏采青 主 编  
郑 谦 王 宏 副 主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 “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郑 谦

“斗、批、改”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又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和阶段。它提出于1966年，于1968年至1969年达到高潮，1971年以后，以不了了之而告终。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这个阶段所出现的各种令人目不暇接、规模巨大的事件和活动，而是在这个被称作是“大立无产阶级新生事物”的阶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认识，以及依据这些认识去实践着的某种社会主义模式。

“斗、批、改”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期。1966年7月2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把学校里的运动概括为“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几天后，在8月1日下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上，毛

泽东在发言中批评工作组时，用了“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的提法。在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段文字比较完整、准确地表达出了当时毛泽东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目标和过程的设想。同年12月下旬，毛泽东曾经预言，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很快就超出了他的预计和设想。随着1967年1月上海夺权引发的“全面夺权”、“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斗、批、改”不仅不得不一再往后推移，而且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从1968年起，由于认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sup>①</sup>，所以要求“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sup>②</sup>在1968年至1970年间，毛泽东思考

---

<sup>①②</sup>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的重点是稳定形势，落实政策，并通过“斗、批、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1968年9月7日，两报一刊在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社论进一步指出：“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同年10月13日，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预计，“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夏季“差不多了”，“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可以基本完成”。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表示，“文化大革命”还有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

不难看出，“斗、批、改”的口号从1966年正式提出到1968、1969年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实践，其内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在于，它已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内容和目标，而成为一个在“全面夺权”之后，在革委会领导下的、区别于“大乱”的“大治”阶段。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一运动达到“天下大治”，并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继1958年之后，建立理想社会的又一次重要

尝试。当时，人们也都普遍地把“斗、批、改”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扫尾阶段”，都在企盼着那个美好、公正、纯洁但却又陌生、迷惘的“新世界”的降临。

## 二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毛泽东对“斗、批、改”的重视程度，都不亚于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视。

1967年初，当最初几个省级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党的整顿、教育革命等问题了。只是因为接踵而至的“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他的这些设想才暂时搁置。1967年底，形势稍有安定，他又立即提出了“斗、批、改”的某些具体内容。从1968年起，随着全国省级革委会陆续建立，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他开始把“斗、批、改”当作紧迫的主要任务，一项紧接着一项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如果把当时毛泽东发出的有关指示，以及根据这些指示撰写的重要社论、文章或编者按等按发出或发表的时间加以排列，那么，我们便不难看到毛泽东当时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思路，不难感受到他的迫切心情。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革命委员会要实现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

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sup>①</sup>

——批示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sup>②</sup>。

——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委会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并配发重要编者按<sup>③</sup>。

——“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sup>④</sup>

——“认真搞好斗、批、改。”<sup>⑤</sup>

——“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sup>⑥</sup>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

---

①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1968年3月28日。

② 1968年5月19日。

③ 《人民日报》，1968年7月11日。

④ 《人民日报》：《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1968年7月22日。

⑤ 1968年8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批改。

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8月15日。

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sup>①</sup>

——对一份反映北京二七机车厂领导班子问题的材料作出批示，要求“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并再次提出吸收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的问题。

——提出“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sup>②</sup>

——“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sup>③</sup>

---

① 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杂志 1968 年 8 月 25 日。这两段话是文章中公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② 1968 年 8 月对《营口市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的批改。

③ 《人民日报》1968 年 9 月 5 日转载《红旗》杂志文章《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编者按，编者按为毛泽东所写。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sup>①</sup>。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sup>②</sup>

——提出由工农兵给“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以“再教育”<sup>③</sup>。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sup>④</sup>

——“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消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sup>⑤</sup>

——提出讨论“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sup>⑥</sup>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sup>⑦</sup>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

---

① 1968年9月4日在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上的批示。

② ⑥⑦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0、14日、10月5日。

③ 《红旗》杂志，1968年10月14日。

④ 1968年11月对《人民日报》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编者按的批示。

⑤ 1968年12月1日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的批示。

有必要。”<sup>①</sup>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sup>②</sup>

196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sup>③</sup>。他希望全党全国团结起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在比较安定的形势中，通过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里全面的斗、批、改，“大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为了把自己的设想和指示具体化，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还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大立”的典型<sup>④</sup>。1968年至1970年间，“六厂二校”几乎提供了“斗、批、改”运动所有方面的典型经验。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等发表了大量社论、文章、调查报告、典型经验，解释和宣传毛泽东的各项指示。这些指示和“六厂二校”经验以及舆论宣传，实际上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蓝图，虽

---

① 《人民日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编者按，1968年12月22日。

② 1968年12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的宣传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的批改。

③ 《人民日报》，1969年2月21日

④ “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然这个蓝图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若隐若现，将信将疑。

### 三

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具体形式和过程有所不同，但“斗、批、改”主要集中在1968年至1970年的三年中。在这三年中，各地、各部门先后进行了建立各级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农村商业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及扩大所有制规模等等一系列活动。在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都要贯穿“革命大批判开路”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原因在于它不仅为建立一个新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而且也使人们掌握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天下大乱”和极左思潮泛滥来说，“斗、批、改”的本意，是想稳定形势，着力于“大立”。当时，尽管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指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整个“斗、批、改”运动表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这里，既有毛泽东建立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懈努力，也有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煽动极左思潮继续制造大规模的动乱和破坏，还有党内外逐渐发展起来的

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实践；既有毛泽东的一般号召和中央下发的各种文件、树立的各种典型，也有各级领导依据自己的理解从不同方面各有增减的发挥。总的来说，前期的“斗、批、改”仍然为“左”的或极左的错误所支配，但在后期，虽然“左”的错误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其势头已明显削弱，一种比较务实的，带有“复旧”色彩的实践普遍地开展起来。

1968年至1969年间，许多地方的农村出现了撤区并社和扩社并队，把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因“割私有制尾巴”、“挖私根”而部分或全部收回自留地、自留树，因批判“物质刺激”取消定额记工制度。一些农村以各种名目程度不同地取消或限制集市贸易。一些社队为“扭转自留地商品化，防止产生资本主义倾向”，规定自留地只能种粮食作物、猪饲料和自给的蔬菜，而不准种收入高的经济作物。1968年间，一些地方为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又开始推行“吃粮不要钱”，并将合作医疗改为公费医疗。

在工厂企业“斗、批、改”初期，“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理解为基本废除“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工人进行‘管、卡、压’的各项规章制度”，而代之以准军事性质的组织体制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学习、评改以及革命大批判。由于认定“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是“修正主义

企业管理制度的灵魂”<sup>①</sup>，而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sup>②</sup>。奖金制度被取缔，成本利润等经济核算也变为无足轻重。从1969年起，将企业综合奖改为附加工资，实行按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并实际上取消了计件工资<sup>③</sup>。

根据“一元化”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委会体制，完全取消了党、政、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起码分工，使之成为党政机关及一切工厂、企业、学校、商店、医院、人民公社领导机构的代名词。为了“精兵简政”，刚成立的革委会都不切实际地将工作人员减少到根本无法维持正常工作的程度。例如1968年上半年成立的武汉市革委会，工作人员仅90人。

为使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1968年9、10月间，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从1968年底至1970年，各地不顾具体条件，在缺乏各种必要准备和长远规划的情况下，或依靠革命热情，或借助行政命令，将400余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边疆。与此同时，为了使广大干部“重新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数百万干部、教师、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及其家属，也被下放到农村和各种“五·七干校”。为了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①② 《红旗》杂志：《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1969年第6、7期合刊。

③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大批城市医院也被下放，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一座城市只留一座医院。根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有大批被认为是“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也“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sup>①</sup>。

在整个“斗、批、改”中最先被提出的“教育革命”，首先要求工宣队、贫宣队要“永远领导学校”。对以往“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而代之以取消考试的教育制度和“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的招生制度。学生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学习文化知识，而是进行各种阶级斗争和从事各种生产劳动，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使命。循序渐进的系统学习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繁琐哲学”，“干啥学啥”、“以干代学”取代了学校的基础教育。1969年至1970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中学可以取消物理、化学课，原因是其内容“陈腐不堪”，“崇拜死人、洋人”，“向学生散布大量毒素”，顶多“拣实用的学学就可以了”<sup>②</sup>。

---

①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

② 《人民日报》，1969年9月22日、7月21日。

在文化艺术领域，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扫荡后，到“斗、批、改”阶段，这个领域除了几个样板戏以及“忠字舞”、“语录歌”外，几乎是一片荒芜。1968年5月，样板戏的创作原则被概括为“三突出”。这个原则不仅成为以后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根据，而且成为人们思维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模式。

最后，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思路，在1968年、1969年的“斗、批、改”高潮之后，紧接着便是1970年的经济“跃进”。“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sup>①</sup>。工业生产的新发展“来势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它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厚”<sup>②</sup>。这种理论逻辑与时间顺序上的高度重合，向人们完整地展示了一种发展战略和模式，一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整个“斗、批、改”运动内容庞杂，形式纷繁，其中包含的各种运动或前后相接，或互相重叠交叉，多项内容同时进行，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一俟历史尘埃落定，整个运动的特征便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首先，它是以阶级

---

①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0年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② 《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1969年2月21日。

斗争支配一切，以行政权力和群众运动进行一切，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作用主宰一切的。在这里，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实际上确立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主导地位。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再是其基本矛盾和人们的物质需要，而是上层建筑等领域里一次又一次尖锐的阶级斗争。人们仍然必须从阶级斗争中寻找各种问题的终极根源和答案，从生产组织到经济运行，从邻里纠纷到夫妻龃龉，从意见分歧到性格缺陷……。这些本应求助于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以及各种法律和组织的问題，统统被归结为阶级斗争，诉诸于行政权力。社会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其自我调节和组织的功能，已多数交给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和各种行政权力。一切事情都变得简单明了，一切问题又都难以正常解决。

强烈的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例如，用群众代表参加革委会以实现群众对政权的参与，用干部下放到实现干部与群众的平等，以大队核算来填补贫富生产队之间的差距，以取消自留地的方法消灭农民之间因自留地经营好坏而产生的差别，以取消奖金和一些特殊津贴的方式实现工人在分配上的公正，以大量减少规章制度的方法使工人成为工厂里的主人，用取消考试来消灭学生在分数面前的不平等，用“上、管、改”来实现学生与教师在教学关系上的平等，用



“知识分子与工农划等号”去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医护一条龙”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分工，用大规模下放城镇人口来填平城乡差别，如此等等。这种平等和公正的要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我们几乎在“斗、批、改”中的每一项活动中都可以听到它的大声疾呼，尽管它在实际上使人们感受到的往往是苦涩和虚幻。

还有纯洁。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需要，也是“斗、批、改”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这种纯洁首先表现在思想道德领域之中。在这里，一切都被简洁明了地划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绝对对立的部分。人们都被要求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修炼，以实现道德净化。此外，还有通过取缔个体经营，提高公有制程度以求得所有制的纯洁。通过“清理阶级队伍”保持阶级队伍的纯洁，通过“整党建党”保持党组织的纯洁，将“四类分子”下放农村以保持城市的纯洁，如此等等。人们被告知这种纯洁的境地将最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人们却不知道——甚至没有想到——这种纯洁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力为基础。

如果理性的思考再深入一步，我们便不难发现，“斗、批、改”阶段的几个鲜明特点又是与对商品经济及其相应的观念形态的忧虑和限制密切相关的。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